

目 录

骑田岭上瞻中原

——忆湘南暴动的一个片断

.....肖 克 (1)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再道 (7)

军调三人小组第二十六小组斗争记

停战之后——上校代表——艰巨任务——

第一回合——针锋相对——揭穿阴谋——

挤走汉夫——易里上校——话中有话——

内战爆发

.....李逸民 (46)

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忆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

.....黄松坚 姜茂生 磨力 李治平 (65)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记中央苏区保护山阵地战

.....邓克明 (89)

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

.....王亚文 (99)

浴血奋进

——从郭村保卫战到黄桥决战

.....张震东 (117)

马本斋同志在鲁西北张同钰 (142)

回忆北伐军团长蒋先云吴仲禧 (156)

董必武同志早年活动点滴吴家骐 (167)

忆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兴国模范县

.....周爱民 (179)

护送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到苏区

.....卢伟良 (185)

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袁福生 (189)

专 访

肖劲光同志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一段经历

——访伍修权同志

.....本刊记者 石肖岩 (191)

书 信

关于李汉俊

李书城致觉明的一封信..... (197)

关于瞿秋白烈士的资料

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宋希濂 (201)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高春林 (209)

騎田嶺上瞻中原

——忆湘南暴动的一个片断

肖 克

一九二六年春，我去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年春天，转到我党领导下的叶挺部二十四师，任连政治指导员。就在这年夏季武汉政府军队进军河南讨伐奉系军阀的征途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南进中任连长。十月，起义军在东江失败，我流落广州、粤北，生活十分困难，但对革命毫不灰心，决心回湘南找党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湘南十几个县，农民运动热火朝天，群众基础很好。这时，各地党组织已遭破坏，农民协会均被解散。广大农民群众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隐藏在心头，他们渴望着革命的烈火重新燃烧起来。

我回到了湘南，急切地四处走访，寻找党的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参加过大革命学生运动的老同学。双方都表明自己加入了共产党。他说，临武县有个地下党支部，中心在牛头汾，负责人是贺辉庭（贺于一九二九年被临武豪绅杀害），我便请他立即去牛头汾找贺辉庭同志联系。过了一天，他回来了，说贺辉庭同志欢迎我去和他们接头。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到牛头汾，经中共临

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这样，我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

在临武支部，我参加了两次会。一次是在党员傅昌表同志家里。傅昌表后来到耒阳参加了湘南起义，据黄克诚同志说，他在耒阳县小水铺不幸牺牲。另一次会是在野外开的。我们研究了如何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和开展革命斗争。大约到牛头汾半个月左右，有一天，贺辉庭同志告诉我，宜章县的黄沙区有个以碣石彭家为中心的党支部，领导人叫彭晒，打进了地主武装，当民团团长，掌握三十多支枪。他们派了个代表来与我们联系。当晚，贺辉庭带我到傅昌表家与碣石村来的同志见了面。来人叫彭睽（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江西大柏地作战牺牲），中等身材，圆圆脸。他热情而小心地介绍了宜章碣石彭家和那一带的革命发展情况，还告诉到我碣石联络的办法：平时，可直接找承启学校校长吴汉杰（湘南起义后，长期参加革命战争，解放后在广东工作，已去世），他是我们的同志；如放寒、暑假，就到村里找“周攸华”，那是支部的联络代号。

不久，我赶回嘉禾老家，同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家和从长沙衡阳读书回乡的八名党员，互相串联，建立了嘉禾南区党支部，并推举曾在大革命时期在嘉禾办过农民协会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黄益善同志（后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连、支队党代表，四军军委秘书长，长征前牺牲）为支部书记，还通过临武支部告诉了碣石支部。于是，我们三个支部基本上串联起来了。

不久，听到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在宜章起义的消息，我们惊喜若狂。我得到支部同意，约了另外两位同志一同去碣石，参加宜

章的年关暴动。走了两天半，翻山越岭，终于到了碣石。碣石已在头一天宣布暴动，挂起红旗了。承启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直接到村子里找“周攸华”。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正好对面来了个三十多岁、气质不凡的男子汉，他询问我们：“你们找谁？”我说：“找‘周攸华’。”他惊疑地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什么‘周攸华’。”我肯定地说有。他又问了其他的人，都说不知道谁是“周攸华”。他颇严厉地对我们说：“走！跟我走！”于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房子里去了。里面有一个好象是负责的人接连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你认识‘周攸华’吗？”

“在哪里认识的？”“找他干什么？”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他，并任意说周是我在衡阳的同学。他听了我的介绍和回答的语气，随即大笑起来，说：“算了，不用问了！”原来他就是彭晒同志

（彭在湘南起义后参加红军，一九二八年七月红四军二十九团（宜章农民团）由井冈山回湘南溃散后牺牲），他早已知道我的政治态度。一会儿，彭睽进来了，我们虽然认识不久，也算老朋友了。于是一切释然。领我来的那位是周廷彦同志，他也是参加湘南起义之后上井冈山的，后来在赣南牺牲了。我们说明是来参加起义的，这样就和碣石支部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彭儒、吴统莲（后改名吴仲廉）等同志，晚上，开支支部会，支部书记彭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组织委员吴统莲把我们三人的组织关系正式接收下来。从此，我们便参加了宜章黄沙区碣石的年关暴动。根据支部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革命武装——独立营（后为二团三营）副营长（营长为彭晒同志）。因为队伍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是连长，彭睽是党代表。他们知道我在叶挺部队工作过，所以叫我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彭晒同志是全面领

导。彭睽同志为支部宣传委员兼任连党代表，他又是村农民协会委员长，主要管地方工作。彭晒、吴统莲同志经常到队伍中来讲政治课，教革命歌，支部在暴动中充分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

我们把队伍整顿一下，就四处游击。附近大黄家有个恶霸地主，有武装，群众都恨他。我们乘夜包围，打死了大恶霸，使广大农民群众振奋起来。我们还协助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把地主的田契、账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把打土豪所得的浮产分给穷苦的农民，只十天半月，整个黄沙区以及靠近广东边界莽山附近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我们在宜章西南山区坚持了两个多月的革命斗争。此时，朱德、陈毅的部队正在郴州、耒阳一带，对湘粤两省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国民党派湖南、广东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南北夹击，占领了宜章到衡阳的大道。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我营因处于较偏僻的宜章西南山区，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就靠近白沙区梅田镇，和白沙区的领导人王政（区委书记，宜章人）、欧阳祖光（区苏维埃主席）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汇合。为统一指挥，合组为宜章独立营，男女老少五、六百人，枪七、八十支，梭镖三百多杆。敌军占领宜章城后，反动民团又占领了黄沙，逼近梅田。当时我们虽然力量薄弱，但士气旺盛，雨夜袭击了离梅田十二、三里地之敌，给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增兵进攻，我们退到麻田村。麻田村是骑田岭南麓一个大村庄，松杉参天，地势较好。但敌人又从临武、梅田几路进逼，我们决定从麻田北面上山，登上了黄岑岭。黄岑岭是骑田岭的主峰之一，背靠岭海，瞩目中原。当我们登上山峰时，队

列里红旗迎风招展，梭镖倒插云天，战士们唱着嘹亮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时，我曾写诗赞道：

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

莫谓湘南侧岭海，骑田岭上瞩中原。

队伍在骑田岭地区活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和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又离开家乡，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几个领导人多方计议，认为现时毛泽东同志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在宁冈、酃县（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地名）一带活动，也估计到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和宜章县委及胡少海同志率领的宜章农民武装，一定东去。于是，决定向东。四月中旬的一天，在龚璿（朱德同志派到宜章西南地区做改造散兵游勇工作的同志，这时期同我们行动）、欧阳祖光和我的带领下（王政率少数武装及老小转回梅田地区坚持斗争，故未东行。彭晒不久前调县机关工作，也未随军），从骑田岭向东进发，经廖家湾、黄家湾下山，深夜从摺岭附近越过宜章至郴州大道，继续前进，登五盖山，向东下去，到达郴县三区，汇合了这里的农民梭镖队，一同向东。走了一天多，郴县三区的农民军，有不少的老小妇女，不利于行军作战，区委就带他们回去了。宜章独立营仍向东前进。

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遇着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毛部是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去湘南活动，打了汝城地区之敌，回师井冈山），久离上级的梭镖营，真象孤雁得群，大家都感到无比地高兴。这是第一个与毛泽东同志部队会师的湘南暴动的农民军。我们首先见到的

是一连长陈毅安同志（一九三〇年陈在红三军团当师长，第一次打长沙牺牲）。陈毅安领我们十几个同志去见毛泽东同志。走了几里，遇见师部派来的通讯员，他把我们领到前面村落中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通讯员大声招呼：“宜章独立营来了！”铺子两边许多人跑出来欢迎。我们问：“毛师长在哪里？”一个同志对我说：“这就是。”群众中一位身材较高大，满脸笑容的红军领导人过来和我们握手，他就是我们久已闻名的毛泽东。同他一起的还有师党代表何挺颖同志。毛师长亲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朱德同志的队伍大概向东去了。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一起行动。

宜章独立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到酃县、宁冈地区，找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军领导人胡少海等同志，并编入由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九团。

从此，我们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伟大的井冈山革命斗争。

陕 北 公 学 校 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努力，努力，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昂首看那边，
战斗地学习！	胜利就在眼前！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 再 道

（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七·二〇事件”平反后，钟汉华、王震、陈再道、王任重、陈丕显同志在一起（左起）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〇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

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革,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

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

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此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一天小组讨论，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

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好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〇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

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肖华同志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肖华同志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 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话”，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 万 雄 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

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交待：“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五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四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五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

“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